

我的人生道路 何子岚
创办燕大之前的司徒雷登 沈建中
抗战中的战地记者 沈宁
父亲的「公有制」记忆 黄豆米
又见济南火车站 姜波

定格历史 收藏记忆

OLD PHOTOS

「老照片」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老照片.第88辑/冯克力主编. —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13.4

ISBN 978-7-5474-0954-1

I.①老… II.①冯… III.①世界史—史料②中国历史—现代史—
史料 IV.①K106 ②K26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60287号

责任编辑 冯克力

装帧设计 王 芳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规 格 140毫米×203毫米

6印张 122幅照片 120千字

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15.00元

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, 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, 须经本社同意。

出版人 尹奎友
 主 编 冯克力
 执行编辑 张 杰
 编 辑 王宝磊
 特邀编辑 丁 东 邵 建
 美术编辑 王 芳

目 录

何子岚	我的人生道路	1
徐 方	我所认识的孙家琇	25
沈建中	创办燕大之前的司徒雷登	33
朱 江	麦文果在南通	42
沈 宁	抗战中的战地记者	66
庞守义	我与石少华的一段交往	84
邹土方	溥杰先生二三事	93
黄豆米	父亲的“公有制”记忆	99
雷 伟	“游泳领队”与“篮球教练”	112

姜 波	又见济南火车站	117
张军勇	近代西方视野里的威海形象	127
楚泽涵	彭家往事：外祖父和外祖母	154
李 岩	父亲“老豆”	164
尹淑金	叔叔尹舟	173
谭金土	梅兰芳、俞振飞《游园惊梦》剧照	178
蔡登山	也将柔情酬知己	181
冯克力	一座老站的消失	188



我的人生道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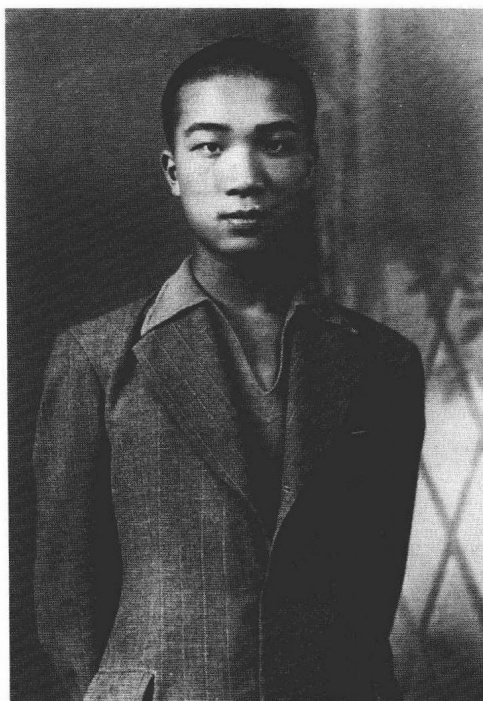
何子岚 口述 陈卫平 整理

整理者小记：1981年，东京，一位五十六岁的中国教师走下飞机。他姓何，名子岚，应聘就任中文学校的教师，这他是三十六年后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。为何日本的学校要聘请一位年过半百的中国教师，而且还只是位在中国教中小学生的教师？三十六年前他留学日本时，名何光澍，为何又改名何子岚？听说他回国后身经抗战后期、二二八事件和抗美援朝，他身处其中又有怎样的经历？一些年后，我与何老师有过多次交谈，于是有了下面的记录。

留日和女友

我生于1925年，本名何光澍。因为1942年结识了一位日本女朋友，1944年她去世，为怀念她，我想改一个能记得起她的名字。最初考虑直接用她的名字，但“凤子”，听起来不似男性，接着考虑把顺序倒过来，叫“子凤”，念了几次，感觉拗口。后来从字形上考虑，定为“子岚”。

凤子的爷爷，叫宫崎滔天。滔天兄弟中多是名人。宫崎八



1944年，在日本留学时的何子岚。

郎（1851—1877），宫崎家次子。深受卢梭《民约论》影响，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先驱者，虽然死时年仅二十七岁，但对三个弟弟，即六子宫崎民藏（1865—1928）、七子宫崎弥藏（1867—1896）和八子宫崎虎藏（1871—1922，也称寅藏，日语中寅与虎同音。号滔天）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。民藏兄弟三人都帮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。但是弥藏早亡，民藏还要从事日本土地运动，只有滔天一生倾全力帮助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，被孙中山称为最可靠的朋友。另外，民藏之子宫崎世民（1902—1985）战后长期担任日中友协理事长，与几代中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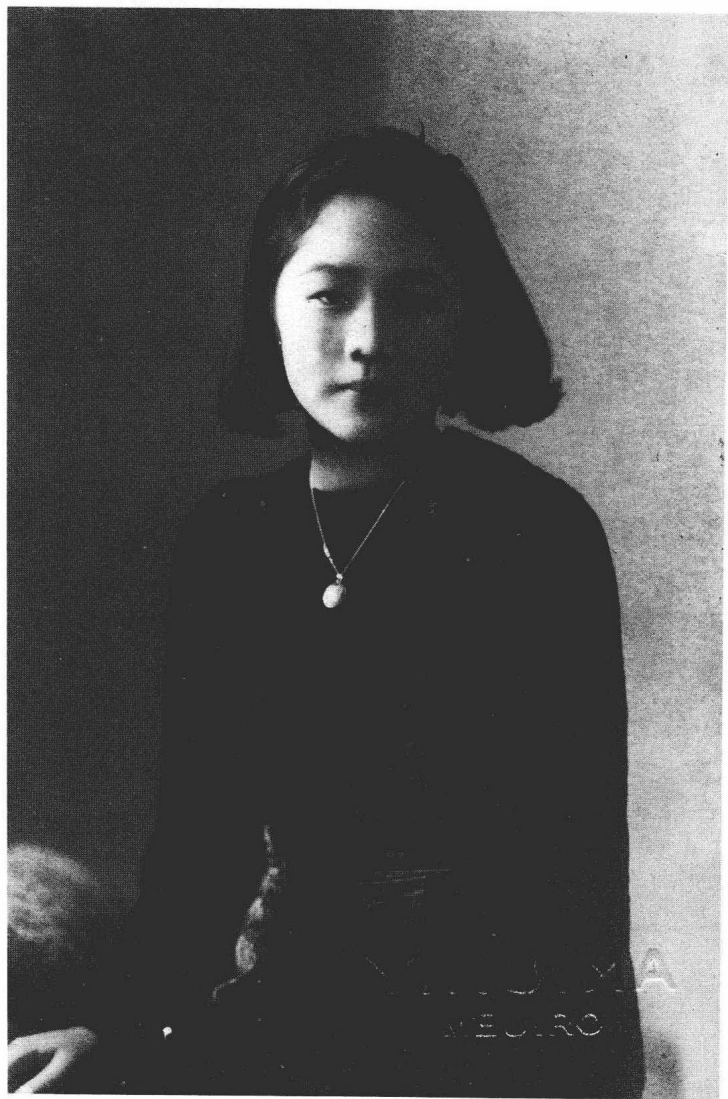


风子的母亲绫野夫人。

领导人都有交往。

滔天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宫崎龙介（1892—1971）和次子震作（1894—1936）。次子夫人名绫野。震作有两个女儿，次女就是风子（1926—1944）。

我与风子的结识，其实很简单。刚到东京留学时，我听说



何子岚的日本女友凤子

在目白车站附近，有一个为纪念孙中山与滔天友谊而盖的留学生宿舍。抱着半是好奇、半是崇敬的心情，我到了那里。进门就看见一块匾额，上面有孙中山写的三个大字：文虎社。文是孙文的文，虎自然是虎（寅）藏的虎，我决心要住进去，也就真的住进去了。

文虎社是一幢U字形木造两层楼，东西走向并向南边伸出。西边住的是管理宿舍的宫崎家人，中间（即南边）和东边分隔开十几个房间，住留学生。原来管理宿舍的是滔天的次子震作，但他过世很早，我去时是居孀的绫野夫人在管理。她只有两个女儿，长女不三子已结婚，常带着孩子来文虎社玩。小女儿叫凤子，比我小一岁，因为得了肺结核，从大学退学在家养病。我觉得人和人是有缘分的。一开始我在宫崎家就没有外人的感觉。我觉得和绫野夫人的关系像母子，和不三子的关系像姐弟，和凤子一直保持很深的很纯洁的感情。常常是吃完晚饭后，到起居室和她们三人一起消磨一段时光，总有说不完的话。夫人曾给我看滔天的著书《三十三年之梦》。滔天文笔流畅，文章一气呵成，有豪迈侠义的气概，表达了对中国革命的信心和对孙中山的尊崇。夫人也常谈她所见闻的滔天和孙中山的友情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她谈得较多的，是亚细亚主义思潮，我感觉绫野夫人与这一思潮是有共鸣的。那时常来她家的，还有一位印度客人，姓辛（音）。他对我也很和蔼，还教我唱印度歌。我现在只记得一首歌的第一句：冈贝玛达朗（音）。

“冈贝”，意即甘地，应该是首歌颂甘地的歌曲。绫野夫人还给我看一些与中国革命党人有关的物件。有一次拿出一个可套在手指上的藤环，她说这是孙中山送给滔天的。用一种咖啡色的植物细藤编织而成，编法很复杂，编得很精致。孙中山是在

夏威夷时学会了编织。

我与凤子之间的感情基础，是音乐。我从小对音乐感兴趣，但缺乏这样的环境，只会欣赏一些轻音乐，是凤子把我带进了古典音乐的世界。她一个一个曲子地给我介绍她的体会，从乐曲的旋律谈到作曲家的生平，谈到作品的时代背景等等。正是在她的引导下，我熟悉了几十首较大的曲子，养成了终生爱好古典音乐的兴趣。

凤子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，后来又得了很麻烦的肠梗阻。医生来看了几次，说本来可以做手术，但凤子现在的身体已经不起手术了。绫野夫人在痛苦地思考了两天以后，终于同意了最后的办法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安乐死。在凤子身上注射一种药物，让她就此长眠不醒。注射的那天早上，照顾凤子的老太太在凤子的床头放上了几枝白花，凤子看见白花说：“凤子是不是要死啊。”这是她最后的一句话。在给她守灵的晚上，只有我一个人守到最后。火葬那天，捡骨灰的是绫野夫人和我两个人。我偷偷地把一两块骨灰藏了起来，以后装入一个精致的赛璐璐小盒，一直带在身上。1966年“文革”爆发，我估计红卫兵会来抄家，就把骨灰和绫野夫人送我的相片都处理掉了。因为照片上夫人穿的是和服，背面写给我的话是：我的儿子。

整理者附记：宫崎龙介（1892—1971），滔天长子。1956年应邀访华，毛泽东接见他时提起，当年滔天先生来长沙参加黄兴葬礼时，曾给他写过信，请他来为新民学会讲演。龙介回国后遍觅无着，十年后在一堆不起眼的文书中偶然发现这件手迹。后收入《毛泽东早年著作集》（湖南人民出版社，1990年版）。

杭州办报

时间是1945年6月到10月。我们在杭州办了四期杂志，出了二十天报纸。时间虽短，但却是先由汪伪特务出钱，后又转手到国民党地下机关，但我们有办报的自主权。

当时，我们八个广东籍留学生，在1945年初回国。领头的是关世雄（整理者按：关世雄1922—1998，祖籍番禺，生长在北京。回国后参加中共地下党，曾任全国政协常委，北京市政协副主席）。关的文笔很好。大家的想法是赶上抗日最后一班车。有人想去大后方，有人想去延安，但都苦于没有关系。这时有一个留日同学，叫李幼汉，台湾人，邀我们到杭州办报。他父亲是日本华北派遣军特务头目之一，叫李文。在日军头目根本博手下任职。李幼汉在杭州的日本特务机关任职，不过他是一个浪荡公子，基本是挂名。他知道我们不喜欢日本，见面时，他拿下墙上的照片，打开后面镜框，里面有一面青天白日旗，他告诉我们，自己也有另一面。为出报刊，他向日本人要钱，我们再去也找他要钱。以后，也是广东老乡的欧阳可亮到杭州，与我们一起办报。此人曾在日本人办的（上海）东亚同文书院教中文，并利用结交的日本关系，在沦陷后的上海出版《国风报》。

到杭州后，一个伙伴认识国民党地下工作的头头庄保庆，把他介绍给了我们。庄保庆怕我们不相信，就拿出委任状给我们看。至今记得很清楚，这是我看过的最小的委任状，只有巴掌那么大。也许因地下工作的关系，不能弄太大吧。上面写着：中将銜参议。有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大印。他是在

沦陷区公开活动的，给了我们一千万元，我们只收到五百万（被中间人私吞了一半）。我们拿国民党的钱出一份名叫《河山》的杂志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取岳飞“大好河山”之意。《河山》8月1日出刊，为避日伪迫害，7月31日我们就跑到上海去了。庄给我们找了一栋小洋房，还派了一个厨子给我们做饭。住了十天左右，大约8月10日前后，庄来到上海，把我们叫到国际饭店，他说昨天美国在长崎扔了一个杀伤力很大的炸弹，大概日本支持不下去了，让我们到杭州办报，叫《大汉报》。8月11日开始出地下版，关世雄每天写一篇社论，我负责收听延安和重庆的电台，记录下来，作为报纸的新闻。白天在街上向市民散发报纸，晚上在街头刷大标语（有人在路口望风）。四天以后是“八一五”，抗战胜利了，我们把地下版改成了地上版，版式改为四开，但出了一周左右就散伙了。推测原因，大约两条：一是关世雄与庄保庆谈不拢，因为我们办报只想要钱，不想被人控制；二是在庄的方面，地位不稳（接收时出了问题）。庄要发给我们三个月的遣散费，我们一分钱不要，跟他的缘分就此为止。

这期间还有个插曲。一个叫卢志彬的台湾人，和我们同住。大家怀疑他是李幼汉派来监视我们的。我们用广东话商量，要把他活埋了。我们以为他听不懂广东话，不料他听了走过来，他和李没有关系。上世纪80年代我来日本后，碰见一个当年留日的同学，他说卢回台湾后参加了共产党，1950年代被逮捕枪杀了。

李幼汉的故事还没有完。抗战胜利后我到台湾工作，偶然与他相遇。听另一位留日同学说他已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。1948年日本旧军人根本博秘密进入台湾，就是他到日本接来



留学生们在日本海滨，前排左一为何子岚，后排右一是关世雄。约摄于1944年。

的。根本博化名林保忠，在台湾秘密活动。我1981年再度来日本后，才逐渐知道，当时来台日本旧军人以后发展成顾问团，称“白团”，为国民党军提供各种服务。90年代后，他们当年的活动渐为人知，日本NHK电视台曾以“白团”为题制作播放过纪实节目。

整理者附记：据最近的研究，庄保庆（1909—1986）在抗战时期实为地下党潘汉年组织的一员。抗战胜利后到香港经营华丰公司，积极帮助大陆的各项事业（包括受托护送李济深等人北上、促成程思远返回大陆等）。1960年在深圳被捕，1972年出狱回故乡杭州。“文革”后获得彻底平反，1986年病逝于香港。何子岚老先生当年不可能知道这些，但是他的回忆为了解庄保庆老人提供了新的证明。

在台湾身经“二二八”

抗战胜利后，广东老乡欧阳可亮到台湾办报，名《自强时报》。1946年6月我到了台北，与名叫纪江的台湾报人一起办这家报纸。

后来，我感到欧阳有些言过其实。这时，台湾省政府法制委员会登报招聘日文编译，我参加了考试，得了第二名（纪江考了第一名，但他不想进去），成了公务员，任法制委员会编译。当时从大陆来的一般待遇较高，可以自己填表申请级别，我只填了委任二级，二百二十元底薪。那时最高是二百四十元，最低二百元。在这期间，我结识了一位朋友，从香港来台大上学。她给我看了两本书：《新民主主义论》和《论联合政府》，都是香港出版，在台大左倾学生中都有传看。我逐渐认识到共产党会胜利，但是没想到会那么快，因为对农民革命没有信心。我产生了不当公务员的想法。1947年2月27日，即二二八事件前一天，我辞了职，到台湾的中国旅行社工作了两年。

“二二八”到“二二九”之间有些恐怖气氛，以后是无政府状态。除了嘉义有谢雪红外，据我的观察，其他地方的“二二八”并不那么轰轰烈烈，主要是没有枪（嘉义有飞机场、军火库）。台北有一些地头蛇在起哄，要攻打长官公署，他们托人找到我，要我提供里面的建筑和设施布局，我都说了。并告诉说长官公署里只有一个排，最后因他们之间意见不统一，也没有攻打，不了了之。

国民党军大举登陆时，我在基隆，住在一家商店里。从门缝里往外看，士兵们弯腰前进。走在前面的应该是连长，排长

没那么大派头，而营长不会亲自带士兵上街。到了可以外出的时候，我上街一看，每个交叉路口都有死尸。死者黑裤子，白上衣，而且小伙子多，的确是滥杀。但尸体很快都被处理掉，听当地人说，多数都扔到海里去了。我到码头一看，海面上漂浮着尸体，尸体的手被反绑着，嘴里勒着铁丝。当地人说：看，那个尸体就是前些日子嘉义（谢雪红那里）派来在大街上作过演讲的人。因此我想，在国民党大军登陆以前，长官公署已经开始秘密收集有关情报了。我在法制委员会工作时，对面的欧严华（女），广东人，嫁给一位王姓台湾人（大概叫王添登），王是《民生报》社长，只因对国民党有些不满，夫妇二人都被杀了。

当时，台湾当地人的穿着多受日本影响：灯罩帽，裤腰上别着毛巾，说话则闽南话加日语。我在台湾也是这副打扮，所以与当地人交流没有障碍。国民党军登陆后，如果身着长袍马褂或西装，在外行走没有问题，但如是台湾式打扮，过岗哨要举手才能通过。我觉得自己已是台湾人，宁可举手，也不换衣服。

在中国旅行社时期，工作内容是管车子。总经理黄天迈是军统（当时军统人员来台很多，开不出那么多工资，不少人都兼一份职业）。一次，黄的部下请我吃饭，问我是否喜欢黄经理女儿，说黄有意让我当圆山饭店副经理。意思很明显，只要和他女儿结婚，我即可到圆山饭店任职。当然，也就不能不参加军统。我没有答应。后来因黄调职，这事也就不了了之。管车时我看过黄车子的驾照，赫然写着：郑介民。原来黄开的车子是郑介民的。

单位对面是中旅台湾分社。经理姓程，复员军人。他喜

好音乐，与我的爱好相同，故与他有些往来。无巧不成书。在我回到大陆后，50年代在北京时曾与一位女子相处，在聊天中得知，她竟是程经理的女儿。一次她说因为男友失踪四年，才与我相处的。我突然想到自己在东北军区学习大队被审查两年（1951年10月—1953年10月）之事。就问她的男友是否进过学习大队，她说进过，并对我知道这类事感到不解。我当即说，我也进过学习大队，只是两年，也就是失踪过两年。最后我说，我是过来人，不能在你男友伤口上撒盐。他在里面呆了四年，伤口比我还大。随后我就与程女士分手了。

1949年12月，我和左倾朋友一起从基隆到了香港（以辞职名义离开旅行社，拿了三个月的工资）。因为听说没有关系回大陆也找不到工作，在香港待了半年后，才又一同回到了大陆。

整理者附记：从百度上查到，欧阳可亮（1918—1992），香山县人，清末民初外交家欧阳庚的第二子。1939年入读辅仁大学，毕业于东吴大学。1941年起在东亚同文学院任教。日本投降后到台湾。1954年到日本外务省教中文达二十多年。对甲骨文有研究。1984年受安阳市政府聘为殷商文化研究顾问，安阳师专名誉教授；1986年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和苏州大学客座教授。

参加抗美援朝

1950年6月，我从香港来到北京。不久，在报纸上看到北京新闻学校的招生启事，就去报名。入学需介绍人，我填上了在京的两位留日同学关世雄和方进（方进是我的终身挚友，

他原名汪德坚，是汪精卫的侄孙，回国后奔赴延安，并动员弟弟方禺一起入伍。50年代初期在华北军区政治部，转业后到国家外文局负责日文版《人民中国》杂志，“文革”中在关押中亡故，一种说法是自杀身亡。又，弟弟方禺早在东北战场上牺牲）。入学第一天，被要求填干部登记表。我不懂，问办事员，他说学校前身是新华社新闻干部训练班，进了校门就是干部了。1950年9月1日开学。一进去，一人发一个小马扎，走时背着，放下来坐着学文化。头三个月学习政治。班主任叫肖岩（后来知道是吴冷西夫人）。不久抗美援朝开始，志愿军要三千干部，中央分配到各个部门，新闻学校分到八个名额。经肖岩推荐，我被选上了，除我以外还有一个海归（印尼华侨子弟），他被分配到了空军。

我被分配到东北军区后勤部油料部，带司机班（车型是嘎斯51）。三次战役后美军后撤，丢下许多汽车，上级要求把车开回来。我这时也学会了开车，从油料车到水陆两用汽车都学会了。

一次，我带一个战士押运一列油罐车到前线。因有美军轰炸，开开停停，往返用了五十多天。白天停在山洞里，晚上才能开行。当时我们属于过路部队，只发三天口粮，吃完后再到附近的兵站或朝鲜当地人民委员会领，这次一路上共领了十多次。有时白天有空，我到附近的朝鲜老百姓家，他们都会说日语，我使用日语和他们交谈。我想自己从台湾回来，万一发生问题，我也不能离开岗位，因为无法说清楚。平时就盖着大衣睡在油罐车上，准备与油罐车共存亡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身上的虱子多到无法清理，回来后我索性把衣服烧了。

在油料部期间我很活跃，参加了组织了文娱活动。秘书处